

历史学视域下“北疆文化”研究初探

——“‘北疆文化’发掘与弘扬高层论坛及学术调研会”综述

侯亚蓉 于宏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提出的打造“北疆文化”品牌的倡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北疆文化研究,2023年8月19—24日,由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处主办,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呼和浩特市档案史志馆、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呼和浩特市市委党校、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北疆文化’发掘与弘扬高层论坛及学术调研会”在内蒙古大学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20余所高校、研究所及博物馆等相关部门的50余位学者与会。

在开幕式致辞环节,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刘志彧表示,论坛的目的在于助力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等使命,进一步推进北疆文化交流建设。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仲伟民对北疆文化研究前景作了展望,并主张北疆文化议题应涵盖社会经济史研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为核心开展特色北疆文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从北疆文化的概念出发,认为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性和多元性,而北疆文化研究可融入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采用跨学科研究视角,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论坛主旨报告环节,12位资深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围绕北疆文化发掘与弘扬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北疆文化的概念与意义做了解读,丰富了北疆文化的内容,拓宽了北疆文化的视野,有效提升了中国北疆文化研究水平。

一、北疆文化的内涵、特征与价值

北疆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特征与价值有必要得到进一步明晰,这也有助于夯实北疆文化研究的基础。

纳日碧力戈(内蒙古师范大学)归纳出北疆文化的六个特点,并对北疆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刻解读,指出北疆文化具有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和历史统一性,揭示出北疆文化这一思想概念的时代性与前瞻性。他认为内蒙古地区拥有丰厚的人文资源,建议将其转化为新时代资本,创造符合时代精神思想和理论产品,全面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北疆文化建设。

仲伟民(清华大学)以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为切入点,阐述了北疆文化的复杂性及重要性。北部边疆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独具重要性,最能代表中国的边疆文化,所以是拉铁摩尔立论的基础。拉铁摩尔还更正了“长城是中原政权的传统边界”认识误区,认为长城是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边界,就政治、经济、地理而言,长城是一个过渡地带。北部边疆的复杂性,给我们三点启发:一是农业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二是要明确边疆与边界的概念;三是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在民族学上没有差别。北部边疆

【作者简介】侯亚蓉,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呼和浩特,010021。于宏建,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呼和浩特,010010。

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北部边疆是中国人打破传统天下观的关键区域,宋辽金元是关键时期;其二,北部边疆在元代以后逐渐定型,华北核心区在稳定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中极具重要作用。

林枫(厦门大学)探讨了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三大特色及其在北疆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第一是资料,北疆文化研究要充分利用民间文献(包括族谱、契约、民间文书、碑刻等),深入田野与社会;第二是区域研究,北疆文化研究也要重视区域系统研究以及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且区域研究最终都要回归于全球化;第三是方法论,要充分关注不同学科对于北疆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于宏建(呼和浩特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从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和内蒙古地区红色资源的分布及特征等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红色文化在北疆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北部边疆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形成深厚的红色文化,具有广泛的红色资源,这些都是北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二、北疆文化中的农牧经济文化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是北疆文化中的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农牧经济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贯穿北部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始终,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北疆文化发掘与弘扬的重要议题。

韩茂莉(北京大学)以石峁遗址为例,对石城与农牧交错带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她发现石城与整个内蒙古及北方农牧交错带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其关联之一在于农牧交错带的形成是一个由西向东的渐变过程。石峁人的先祖源于内蒙古地区,石城的修建最早也在内蒙古地区,其先民在凉城、包头一带修建石城后,携带有关文化信息一路南下进入陕北,同时一路东进,经张家口一带进入赤峰,到达今天的辽河流域。在漫长的东西延伸地带产生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一系列石城。

韩昭庆(复旦大学)利用正史文献、地方档案和古地图等资料,采取政区演变、古今地名对比及地图复原的方法,逐一还原清末伊克昭盟四旗放垦的范围,并与今毛乌素沙地范围进行比较,指出绝大部分放垦地段不在此沙区范围内。作为清末新政时期北部边疆社会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蒙地放垦既是为筹措赔款、兵饷,也是通过移民实边来遏制沙俄日益内侵的势头,其对北部边疆农牧业综合开发、土地利用转变起了承前启后作用。

崔思朋(内蒙古大学)从环境史视角出发,指出北方农牧交错带既是生态环境脆弱区,也是生态环境过渡区,比其紧邻的生态系统更易于变动。农耕和游牧经济的更迭是导致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变迁的直接原因,而由于自然环境特殊性的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变化具有多变性及复杂性的特征,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环境景观的构成上,也体现于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因此,除传统意义的历史文化之外,自然环境变迁也是北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锐(鄂尔多斯市博物院)通过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及所属文化形态进行梳理,讲述了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农牧交错及文化融合,强调了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在其中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历史贡献,以及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媒介对于助力“北疆文化”研究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孙久龙(吉林大学)指出,契丹文化受奚族、渤海、室韦等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的多重影响,又与具有草原游牧民族特色的本族文化相融合形成。契丹民族在发展自身游牧文化的同时,不断更新文化观念,创立新文化领域,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不断汲取汇聚,使本源、主源、他源文化融汇贯通,形成一种新型文化。这正是契丹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也是契丹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三、北疆文化中的商贸与交易

历史时期的商业贸易在北疆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学者们使用各类档案、文书、碑刻、地契、地谱等史料进行研究,提出关于北部边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见解和新思路。

许檀(南开大学)通过梳理契约文书、关税档案等史料,对归化城税关、税收变化和经归化城转运的商品进行综合研究,指出归化城是清代北部边疆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与中原贸易的重要枢纽。具体而言,经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商品则以牲畜、皮毛等为主。随着汉蒙边疆经济贸易发展,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在归化城设关榷税,咸丰四年(1854)又将西包头、萨拉齐和托克托城三处增为归化城税关的分税口。

赵珍(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北部边疆具有繁富的农牧资源交换与联系的商业文化特质,对清代大一统的实现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清代是北部边疆商业体系形成的重要时期,以农牧大宗商品为纽带的商贸经济步入新格局,这在全球国别史与中国区域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她对茶马与商路、国制的茶法与茶叶贸易及商贸社会构建等问题展开论述,并指出北商行茶是构建中国北部边疆商贸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茶马等农牧资源亦是清廷治理边疆地区的关键环节。

徐鑫(《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以土地交易为研究对象,通过契约文书论述了蒙汉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在北疆文化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内蒙古各民族交错分布的人口格局及各民族之间广泛深入的交融关系于清代正式形成,其交往方式之一即是土地交易,从中可以看到清代蒙汉交流的平等性、密切性和长期性,而见于土地交易的特殊情况是地谱,它平衡了土地租种者对新耕地的迫切需求以及土地出租者对稳定收入的需求,展现了清代北部边疆繁荣的经济,蒙汉人民也正是通过契约交易,各取所需,共建和谐共存的土地开发模式。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李春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北疆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蒙古地区的具体体现,北疆文化也较好地总结并诠释了以内蒙古地区为核心的北部边疆的人类文明,发掘和弘扬北疆文化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事业的具体体现。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将持续关注“北疆文化”,希望通过更多的学术交流活动发掘与弘扬北疆文化。

(责任编辑:丰若非)